

论《失乐园》

张隆溪

内容提要: 尽管弥尔顿的《失乐园》早已成为英语文学中的经典, 但仍有许多论者批评他将《圣经》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故事用作史诗的题材, 因而缺乏作为史诗要素的英雄业绩和冒险经历。晚近的批评则指责他认可夏娃受诱惑的圣经神话, 从而成为父权社会压迫妇女的帮凶。此文试图对这两种批评做出回应, 认为《失乐园》的伟大和非凡之处恰恰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史诗的传奇和冒险格局, 使善与恶的问题、知识和自由的困惑、乐园的概念和对乐园的追求等等这些带有深刻意义的哲学和宗教问题成为这部史诗的核心, 也正是这些问题使弥尔顿的史诗具有永恒的魅力; 另一方面, 夏娃在这部史诗中作为第一个忏悔的形象, 证明恰好是女人体现出了救世主那为人类赎罪的爱, 也从而说明弥尔顿比起大多数他同时代的人, 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男女性别方面, 他都是一个与当时流行观念格格不入的激进思想家。

关键词: 弥尔顿 《失乐园》 经典 史诗 忏悔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7)01-0036-07

弥尔顿著《失乐园》实为鸿篇巨制, 气势磅礴, 是英国文学中的名著。但在文学史上, 这部作品并没有受到众口一词的赞誉, 却不时有人对之略加微辞, 甚至质疑其价值。美国作家艾伦·坡在《诗的原则》一文中就说, 《失乐园》如此冗长, 不可能处处俱佳, 所以我们“若要视之为诗, 就除非忽略一切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 即统一, 而只把它当作一系列较短小的诗来读”。(Poe: 568—9) T. S. 艾略特更责备弥尔顿对英诗和英国语言有“很坏影响”, 说弥尔顿“写英语好像是死的语言”, 更贬责《失乐园》取材《圣经》极不妥当, 认为“那个神话在《创世纪》里好好的, 本不该去触动, 弥尔顿也并没有作出任何改进”。他还说, 弥尔顿在英国诗人中, “大概是最为古

怪的一个”。(Eliot: 258—68) 艾略特认为“不该去触动”《创世纪》里人之堕落的神话, 以为那不能做史诗的题材, 其实是新古典主义时代一个寻常的批评观念, 也即所谓理性时代的一种科学精神。例如 17 世纪的古典主义诗人约翰·德莱顿在《论讽刺的起源和发展》(1693)一文里, 就认为《失乐园》是失败的作品, 而究其原因, 也说是题材选择不当。德莱顿说:“失败应该归咎于我们的宗教。人们说古代异教信仰可以提供各种文饰, 但基督教却做不到。”(Dryden: 219) 对德莱顿及其同时代人说来, 正像柏拉图早已指出过的, 诗和真理乃南辕北辙, 彼此不同, 所以作为精神真理的基督教不适宜于诗之虚构表现。法国批评家布瓦洛(Boileau)在很有影响的《诗

艺》(*L'Art poétique*)里就说,用诗去处理《圣经》题材,就只会“把真神变成虚假的神”(Du Dieu de vérité faire un Dieu de mensonges)。德莱顿更进一步解释说:“谦卑和顺从是我们最注重的美德;这当中除灵魂的行动之外,不包括任何行动,而英雄史诗则恰恰相反,其必然的布局和最终完善,都一定要求轰轰烈烈的行动。”(Dryden: 219)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失乐园》的中心,唯一的行动不过是一个女人咬了一口苹果,那么弥尔顿的史诗确实就很难与荷马史诗那一类古典作品的典范相比,因为荷马史诗描写的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和特洛伊城的陷落,或是奥德修斯惊天动地的冒险经历。

在当代的批评中,弥尔顿因为采用圣经题材,又引发出一番责难,不过这次的问题不在弥尔顿没有改进圣经的神话,而在他认可了夏娃受诱惑的圣经神话,从而成为父权社会压迫妇女的帮凶。在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看来,弥尔顿的影响是她们所谓“弥尔顿的鬼怪”,是一个“凶狠的魔影”。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说,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亚这个男性作者,和莎士比亚同样甚至更伟大的女性作者就完全不为人知。她说,这位女性作家姑且称为“朱迪丝·莎士比亚”,她之所以无名,是因为她完全被父权社会压制埋没了,而弥尔顿就算“没有亲手杀死‘朱迪丝·莎士比亚’”,他起码也起过作用,“使她数百年来一直死去,一再使她的创造精神脱离‘她时常倒下的躯体’”。吉尔伯特宣称,弥尔顿的著作,尤其是《失乐园》,“构成了格特鲁德·斯泰茵所谓‘父权诗歌’那厌恨女人的核心”。(Gilbert and Gubar: 188)在不少女权主义批评家看来,弥尔顿是父权社会压制女性在文学上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弥尔顿诗作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比较早期的批评。德莱顿说《失乐园》“除灵魂的行动之外,不包括任何行动”,这句话说得大致不差;可是“灵魂的行动”正是《失乐园》精华之所在,也是因之而使

《失乐园》成为人之精神的伟大史诗,而不是赞颂肉体行动和强壮体力的史诗。弥尔顿自己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他在大学生时代就曾打算写一部取材亚瑟王传奇的史诗,一部像斯宾塞的《仙后》那样的民族史诗,但他不久就改变主意,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做出另一种选择,去写“人第一次的不服从,偷食禁果”,(I. 1)去创作“在散文和韵文里迄无前例”的作品。(I. 16)在《失乐园》第九部开头,弥尔顿即将叙述魔鬼的诱惑那带来严重后果的一刻,在那里他又一次强调他所选取的题材与异教史诗相比,有更崇高、更重大的意义,并许诺要描写“更坚忍的耐力和尚未有人歌颂过的英勇殉难”。(IX. 31)对弥尔顿说来,忍耐、顺从和谦卑才是表现道德力量的崇高美德,远比传统的战争和历险的英雄业绩更值得用史诗来表现。安德鲁·费克特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大诗人,如阿利奥斯托、塔索、斯宾塞等人,都以罗马诗人维吉尔为竞争对手,力求写出歌颂一个伟大民族及其君主的“帝国史诗”,但弥尔顿却脱离了那个传统。他毕竟是一位破除偶像的革命家,完全不把君主和世俗权力放在眼里。正如费克特所说,弥尔顿舍弃他最早计划的亚瑟王传奇,转而选择人之堕落作为史诗题材,就“终结了一个文学传统”。(Fichter: 209)《失乐园》之作正当英国革命失败之后,那时诗人已完全失明,并随时有被王党抓捕监禁的危险。这一历史背景至为重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克利斯多夫·希尔宣称,弥尔顿的伟大史诗,包括《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等作品,都“深深卷入政治之中,直接面对革命失败的问题”。(Hill: 362)希尔认为弥尔顿取材人之堕落的圣经故事,目的就在于理解革命何以会失败。他说:

对弥尔顿说来,原罪可以解释这一次的努力何以不成功。但并不是一切都完结了:人之堕落其实是好事。这使上帝不必为邪恶在人世间的存在负责任。这个故事由弥尔顿讲来,还特别突出了人的自由。我们必须接受

全能的上帝的意旨,因为上帝的意愿就是人的定命。但我们也必须随时整装待发,准备好下一次要做得更好。(Hill: 352)

按照希尔的解读,《失乐园》是历史的讽寓,是失败了英国革命的讽寓,同时也是以象征的形式勉励人们,将来会有另一次革命,而那次革命最终将取得成功,并发生深远的影响。

英国革命对于全面理解弥尔顿及其著作固然重要,但我并不认为对阅读《失乐园》而言,英国革命提供了包罗无遗的背景,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背景。在我看来,善与恶的问题、知识和自由的困惑、乐园的概念和对乐园的追求,这些带有深刻意义的哲学和宗教问题才是这部史诗作品的核心,也正是这些问题使弥尔顿的史诗具有永恒的魅力。弥尔顿自己宣称,他写作《失乐园》的目的是要“申明永恒的天命,对人类证明上帝的公正”。(I. 25)颇值得注意的倒不在弥尔顿有如此雄心壮志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是上帝的公正需要证明这一点。正是这些伦理和宗教问题取代了轰轰烈烈的行动,构成弥尔顿史诗使读者着迷的根本原因;而采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非常切合他的目的,因为这个故事以高度象征的形式,提出了有关责任、知识和人的自由这类人生的根本问题。

谁应该为人之堕落负责呢?上帝全能全知,早已预知亚当和夏娃会堕落,可是他为什么放手不管呢?既然他预知人会堕落,甚至可以说他容许了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在人堕落之后,他又为什么要处罚亚当和夏娃呢?人之堕落究竟是预先注定必然会发生的,还是亚当和夏娃用他们的意志所做的自由选择,因而要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呢?就我们的人性和人类状况说来,这一切又能给我们怎样的一些启迪呢?这些就是使《失乐园》成为世界文学中一部伟大经典的问题,无论人们对弥尔顿的艺术或个人信仰提出怎样的疑问,在这些质疑早被遗忘之后,这一部经典还一定会长存于世。

有趣的是,在《失乐园》中,是上帝自己最

先提出责任的问题。在史诗第三部,上帝预言撒旦将成功诱人犯罪,并对圣子耶稣描述撒旦如何飞出地狱:

直飞向那新造的世界,
还有那里的人,如果他能力胜,
便会去攻击人而将之毁灭,否则
便会去诱惑人,而且必定会诱惑;
因为人将听信他虚假的甜言蜜语,
并将轻易地就违背那唯一的禁令,
那是他服从的唯一保证:于是他
和他没有信仰的后代将会堕落。(III 89)

上帝好像感觉到人们可能会怀疑他何以不防止早已预知的恶,于是他自己就提出我们可能会问的问题,然后给予一个证明他完全没有责任的回答:

是谁的过错?
除了他,还有谁?忘恩负义的他
从我这里得到一切;我造就他正直,
有能力自立,也有自由选择堕落。
我创造的天使也都是如此,
那些自立的和那些败落的,
他们都有自由去自立,或去堕落。(III 96)

弥尔顿的诗句在此邀请我们去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关于自由、正义和责任的永恒问题。弥尔顿的上帝说得很清楚,人之堕落是人自己的过失,是由于人受了魔鬼的诱惑。上帝坚持说,虽然他预见一切,但他的预知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做的选择毫无关系,因为

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的反叛;如果说我预知此事,
预知对他们的过失却毫无影响,
即使没有预知,他们也必定如此。
所以完全没有丝毫定命的催促,
或者我的清晰预见之影响,
他们犯下罪过,咎由自取,
全是他们的判断和选择;因为
我把他们造成自由者,他们一直自由,
直到他们自己奴役自己。(III. 111)

弥尔顿的上帝就像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一

再强调自由和责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人类的自由成为一种可怕的自由,因为自由的选择,就像亚当和夏娃的情形那样,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伊琳·佩格尔斯指出,早期的基督徒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得到的主要信息,确实正是有关自由和责任的问题。例如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亚历山大的克里门特就认为,亚当所犯的罪不是性欲的放纵,而是不服从上帝的禁令。佩格尔斯在总结克里门特的看法时说:“亚当和夏娃故事的真正主题是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其要点是指出,我们要为我们自由做出的选择负责,无论这选择是善还是恶,正如亚当所做的选择那样。”(Pagels: xxi)然而问题是,弥尔顿的上帝说了一大番关于自由的话,推卸了一切责任之后,却又去干预,派出天使守卫伊甸园。在诗中,上帝和天使都警告过亚当将有危险,并设法保护人类,不要受撒旦的伤害;而由于这一切努力最终都证明无效,读者当然无可避免地要质疑上帝的效力如何,甚至有什么动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天使尤利尔据说是上帝的“法眼,通观天堂各处”,(III. 650)却未能发现装扮成下级天使的撒旦。史诗叙述者的声音以极端宽容的语气,解释尤利尔何以会失败:

因为天使或人都不能识破
伪善,那唯一完全隐形的恶,
除了上帝,无人能看穿,……
善者在看似无恶之处,
不会想到有恶:于是这一次蒙骗了
尤利尔,虽然他是太阳之王,
以目光锐利而闻名于天堂。(III. 682)

不过人们会由此产生疑问,如果目光锐利的大天使尤利尔没有看透撒旦的伪装,竟可以得到原谅,可怜的亚当和夏娃不过是凡人,他们被化为一条蛇的撒旦所诱惑,上帝又何以如此动怒呢?事实上,上帝对人的重罚,甚至他自己的儿子听起来都觉得有点过分,因为基督告诉他说,如果撒旦使人堕落的阴谋得逞,“您的善意和伟大就都会受到质疑和

亵渎,而无从辩护”。(III. 165)上帝在回答时,许诺给人以慈悲和宽恕,但他又预言人之堕落,而且以严厉可怕的语言,宣布在亚当堕落之后,

他和他的后代必须死亡,或者他,
或者正义,必有一死;除非
有别人能够而且愿意替他付出

严格的代价,以死来顶替死。(III. 209)

弥尔顿在这里当然是作出铺垫,准备好让基督出面来为人斡旋,以动人的诗的形式来表现基督替人赎罪的观念。基督看着上帝严厉的面孔,恳求天父给人以慈悲。他把自己交出来为人赎罪,并且对上帝说:“看着我吧,我替他,我交出生命来顶替生命,让您的愤怒降临在我身上吧。”(III. 236)这是史诗中相当戏剧性的一刻,突出了基督作为崇高的救世主的形象。可是人们不禁要问,一旦有人犯了罪,就要求有一个人必须以死亡来付出“严格的代价”,而且不管这人是谁,只要是人就行,这可算是哪门子的正义?既然弥尔顿的上帝讲出一番道理,读者就必不可免地会作出判断,看其是否合乎逻辑,是否有道理。而既然那番话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失乐园》好像就并没有真正做到“证明上帝的公正”。英国批评家燕卜逊在所著《弥尔顿的上帝》一书里,甚至认为“诗中上帝的形象,也许包括他在预言最后终结那些崇高的时刻,都惊人地像斯大林大叔的样子;都同样是那种粗糙外表下潜藏的隐忍,同样是那种片刻的畅快,同样是彻底的不讲道德,同样是那种真正的坏脾气”。(Empson: 146)燕卜逊认为,《失乐园》几乎表现出弥尔顿对上帝的怨怒,这一看法强化了对弥尔顿的浪漫主义解读,但是这种解读把诗人理解成撒旦式的反叛者,却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在《失乐园》中,对上帝公正的真正证明,在于弥尔顿把人之堕落构想成具有教育意义,是无可避免的事,甚至是因祸而得福,即是所谓 *felix culpa* (有福的罪过),最终会造就更美好的人类状况。在这里,诗人提出的

看法与圣经文本的正统解释有重要的分歧。譬如在弥尔顿笔下,劳作并不是亚当堕落带来的诅咒;换言之,在《圣经》里上帝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世纪》3.19)劳作乃是一种惩罚,但在弥尔顿看来,劳作把人区别于伊甸园中其他一切动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活动,因而是构成人的身份和人之尊严的活动,因为

其他动物都整日游荡,

无所事事,也不需要多休息;

人却每天都有体力或脑力的工作,

这就宣布了人的尊严,

和上天对他所做一切的关爱。(IV.616)

圣奥古斯丁和基督教教会其他一些教父们对人的性爱深感怀疑,认为那是原罪的迹象,但弥尔顿却不同,他把人未堕落之前在伊甸园中的性爱描写为崇高而有尊严的行为,而且断然拒绝“那些伪善者摆出清心寡欲的样子,奢谈纯洁、地位和天真”。(IV.744)诗人唱道:“祝福你,夫妻之爱,神秘的律法,人类后代真正的来源,在其他一切都共同的乐园里,这是人唯一正当可为之事。”(IV.750)他歌颂夫妻之爱,极优美地描绘人类祖先在堕落之前天真无邪做爱的情形,都证明弥尔顿和一般人所想象的清教徒真是有天渊之别:

他们在夜莺的歌声里拥抱着睡去,

花棚在他们裸露的躯体上

洒下红色的玫瑰,到清晨又重新长出。

睡吧,幸福的情侣啊;哦,如果你们不求

更大幸福,乐而知足,那才是最大的幸福。

(IV.771)

然而问题是,难道弥尔顿真可以满足于一个不去追求知识而感到幸福的人类状态吗?什么是知识的本质呢?天真无邪或纯洁的美德是否等同于愚昧无知呢?在史诗第八部,充满好奇的亚当想了解宇宙的情形,天使拉斐尔就告诉他说:“我不怪你探问寻求,因为上天就好像上帝的书展开在你眼前,你在其中可以阅读上帝神奇的创造,了解他所定的季节、时辰、日时、年月。”(VIII.66)但是天使

也很清楚地说明,知识必须有一定限度:

不要让你的思想去探究隐秘的事情,

把它们交给上帝,只服从而畏惧他;

……上天对你说来太高远,

而不可知其究竟;在低处明智吧:

只去想你自己和你的存在相关的。(VIII.167)

柔顺的亚当于是回答说:“不求认识那遥远而没有用、晦涩难辨的事物,而只去了解就在我们眼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就是主要的智慧。”(VIII.191)不过问题在于,那棵被禁的知识之树恰恰就是在亚当和夏娃眼前日常生活中存在于乐园之中的事物,而道德的知识即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对弥尔顿说来绝对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因素之一。亚当在这里讲的话,弥尔顿自己就不可能接受。巴塞尔·威利早已指出过,“在17世纪有图象式和概念式思维的冲突”,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例子。(Willey:242)在描绘乐园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时,弥尔顿不能不按照《圣经·创世纪》的经文,把人之堕落描写成是获得知识,或者是获得知识的后果;与此同时,对弥尔顿就像对剑桥柏拉图派人文主义者来说一样,具有知识和理性是人能够获取道德上的善之唯一途径。

弥尔顿在《基督教义》的论文里明确宣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身上具有神性的成分特别呈现在人的“正当理性之中,这甚至在最坏的人身上,也不会完全泯灭”。(Milton:905)也许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一书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最能够代表他对人类知识的看法——为了更好地理解弥尔顿如何处理知识的问题,尤其在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这个背景上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也必须引用这段话。弥尔顿说:

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就像两个孪生兄弟裂开那样,从一只苹果的表皮突然跳入这个世界。也许这就是亚当认识到善与恶而落入的那个可怕定命,换言之,是通过恶而认识善。

因此,人目前的状态既已如此,那么没有对恶的认识,选择还有什么智慧,还有什么节

制？只有懂得恶，知道恶的各种诱惑和表面的快乐而还仍然节制，还仍然辨识，还仍然去选择真正的善，那才真是经得起考验的基督徒。我无法称赞把自己封闭起来、逃避恶的所谓德性，那没有经过验证、没有见识过人世的德性，那从来不冲出去找敌手对决、却逃离竞赛跑道的德性，在那竞赛之中要赢得不朽的桂冠，就要靠不怕尘土，不怕流汗去努力奔跑。的确，我们没有把天真无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带来的无宁是不纯洁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就是考验，而考验是通过有对手来实现的。因此，在思考恶这方面尚缺乏经验那种德性，不知道恶能够给跟随它的人怎样美好的许诺而仍然拒绝恶那种德性，就不是什么纯粹的德性，而不过是一种空白的德性，其表面的白色不过是一种令人生厌的灰白。（Milton: 728）

弥尔顿把知识和理性摆放在真正美德的根基这一位置上，就等于用人文主义观念重写了基督教新教的教义，于是人之堕落的图象式表现就成为理性统治之失败的象征。弥尔顿用政治斗争的语言把人之堕落描述为过度的企望和欲念篡夺了理性的权位，说它们“夺取了理性的政权，把此前自由的人降为奴隶”。（XII 89）于是伊甸园中的戏剧性变化就成为内在理性之堕落的讽寓，表现了道德力量未能抗拒恶之诱惑而失败。在弥尔顿看来，理性乃神之所赐，最终必将获胜。所以人之堕落并非终极的结果，尽管通往救赎的时期还会很长而且很痛苦：“于是这世界还会这样下去，善者遭难，恶者却左右逢源。”（XII 537）可是，正如在史诗即将完结时天使迈克尔告诉亚当那样，只要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忏悔，“你就不会悔恨离开这个乐园，却将在心中得到一个乐园，远更美好”。（XII 585）

在史诗第十二部，大天使迈克尔教导亚当那些话就代表了弥尔顿的想法，亚当认识到谦卑顺从的意义乃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即“以小而获得大的成就，看似柔弱而胜过世间的刚强，简单顺从而胜过世间的聪慧”。（XII

566）说到这里，我也许可以约略考察一下常常可以听到的对弥尔顿的指控，说他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的厌恨。的确，《失乐园》中常常肯定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例如弥尔顿很明确地说：“他只为了上帝，而她则为了在他身上体现的上帝。”（IV. 299）但是，如果在弥尔顿看来，顺从、谦卑和温驯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美德，那么弥尔顿所描写的夏娃就远比亚当更接近这样的美德。有批评家已经注意到，在自愿承受上帝的恼怒这一点上，基督和夏娃说的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史诗第三部，上帝预言了人之堕落及其可怕后果之后，基督对上帝说：“看着我吧，我替他，我交出生命来顶替生命，让您的愤怒降临在我身上吧。”在史诗第十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互相责怪争吵；而正在争吵得十分激烈时，夏娃首先转变过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且自告奋勇，情愿单独接受全部处罚。“我用哭声向上天哀告”，夏娃对亚当说道：

让所有的判决

都从你的头上移开，降临在

我身上，我才是你一切痛苦的根源，

我，只有我才该是他愤怒的对象。（X. 933）

在这两段对话里，那个一再重复的“我”字是谁也会注意到的。正如芭芭拉·鲁瓦尔斯基所说，“在弥尔顿改写的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中，是女人体现出了救世主那为人类赎罪的爱。”（Lewalski: 19）夏娃诚然是第一个违背上帝的禁令，偷食了禁果，从而导致人之堕落，可是夏娃也是第一个开始忏悔的人。她重复基督所说的话，承担起道德的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要表现夏娃在使人类得救当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实在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她重复基督的话更为强而有力。事实上，仔细阅读弥尔顿的诗和散文作品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比起大多数他同时代的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男女性别方面，他都是一个与当时流行观念格格不入的激进思想家。我认为那正是一部真正经典作品的特质，在经过了各种批评理论的考察评论之后，经典仍将长存

于世,永远给人启示。毫无疑问,弥尔顿的《失乐园》正是世界文学中这样一部伟大的经典。 □

参考文献

1. Dryden, John.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Satire." *Selected Criticism*. Eds. James Kinsley and George Parfitt. Oxford: Oxford UP, 1970.
2. Eliot, T. S. "Milton I" and "Milton II." *Selected Prose of T. S. Eliot*. Ed. Frank Kermod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3. Empson, William. *Milton's God*. Norfolk, Conn.: New Directions, 1961.
4. Fichter, Andrew. *Poets Historical: Dynastic Epic in the Renaissance*. New Haven: Yale UP, 1982.
5. 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P, 1984.

6. Hill, Christopher. *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9.
7. Lewalski, Barbara K. "Milton on Women—Yet Once More." *Milton Studies*. VI (1975): 19.
8. Milton, Joh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Ed. Merritt Y. Hugh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7.
9. Page, Elaine. *Adam, Eve, and the Serp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10. Poe, Edgar Allan. "The Poetic Principle." *The Portable Poe*. Ed. Philip Van Doren Ster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11. Willey, Basil.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Studies in the Thought of the Age in Relation to Poetry and Relig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54.

作者单位: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

文化语言学是兴起于 80 年代中期的一门新学科,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之间关系的学科,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文化与语言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语言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最初始的文化,但只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并非它的全部。语言与文化既是部分与整体的包含关系,又是形式与内容的制约关系。因为一切文化知识都是依靠语言来记载与传播的,即使是属于文化物质层次的现象,也只有通过语言的命名、阐释,才有意义。语言虽是一个内涵相对确定的概念,但其外延、使用范围却极其广泛,它涉及从古到今、从内到外的一切文化现象。所以人们通常把语言称作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对语言与文化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其突出的优点是将语言置于得以产生、存在与表现的具体文化背景之中,从而使人感受到它的活生生的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载负着具体文化内容的语言。这种研究显然对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鉴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鉴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鉴于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位置,《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一书大胆地做出了创新的尝试。作者多年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阿拉伯语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地位、阿拉伯词语与阿拉伯文化、从外来词看文化的接触、阿拉伯语中的比喻与阿拉伯文化、阿拉伯语谚语与阿拉伯文化、时间与文化内涵、阿拉伯语中的习用语、阿拉伯语中的委婉语、阿拉伯语身势语和阿拉伯人名与阿拉伯文化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力求揭示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的某些关系,揭示在阿拉伯语中体现的阿拉伯民族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民族感情、风土民情、社会变革等社会文化因素,并从中总结归纳出一些具有规律性和启发性的特点,以利于阿拉伯语教学、研究及翻译工作。

[周烈等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FOREIGN LITERATURE

BI-MONTHLY, NO. 1, 2007

Editor: HU Wenzhong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Selected Abstracts

ZHAIRunlei Leslie Marmon Silko Preacher of the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3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Leslie Marmon Silko, the youngest writer to be included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The study begins by examining briefly Silko's works and various critical responses to her writing, emphasizing her unique identity as a Native American woman writer. The second part deals with "Yellow Woman," one of her most acclaimed short stories. By adopting an ecofeminist approach, this paper intends to show and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nature in Silko's works and the role it plays in women's search for identity in the Indian culture. It aims to argue that Native American writers like Silko should not simply be regarded as regional writers. Their contribution to nature writing and eventually to American literature should be reevaluated.

QIU Fe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Gender Politics: Interpreting Ian McEwan's "Homemade" 15

Masculinity, as a more powerful term than femininity, is socially acquired instead of naturally born. In modern society, like capitalism itself, masculinity is always in crisis. Ian McEwan's short story "Homemade" uncovers how masculinity is initiated, structured and regulated by the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rogates how masculinity comes to be hegemony. This male hegemony, in "Homemade",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possession of male heterosexuality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first sexual discourse with and possession of a female body, which does not result in pleasure but spiritual loss. The hero is thus trapped in the gender politics which empowers but also confines the masculine identity. Ian McEwan's short story subtly unveils the grotesque and destructive design of the traditional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further deconstructs it through interrogating its formative and normative mechanism.

ZHANG Longxi Paradise Lost: The Making of a Classic 36

Despite its canonical status in English literature,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using the biblical story of the fall of man as the subject matter for an epic, thus lacking the generically expected heroic actions and great adventures. In more recent criticism, it has been faulted for its endorsement of the myth of the temptation of Eve, thus consolidating the subjugation of women in patriarchal society. This essay tries to argue that the unique strength and appeal of *Paradise Lost* resides precisely in abandoning the traditional epic of physical action for probing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of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and that Milton's depiction of Eve as a model of repentance and humility is much more radically positive than any other English poet has ever attempted.

CHENG Wei Puritan Imagination and the 1692 Salem Witchcraft Hysteria: Hawthorne's "Young Goodman Brown" 43

Dense forest, or "wilderness", means different things to the Puritan imagination or sensibility of the early English Puritan immigrants to Salem and their posterity who were born in Salem. To the former, it is "the other", scarcity, hardship test, and the right site of "a city upon a hill", and to the latter, symbol of